

# 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1

# 第一章 历史与知识分子之尊严

历史、文化、知识分子——中国历史与知识分子之特点——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——知识分子与国运——会通中西文化发扬自尊精神

## 一 历史、文化、知识分子

这一本书，乃在历史方式中，论述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。说到历史，在历史哲学上，似乎有若干先决的理论问题，应先加澄清。但这些问题，我将有专书讨论。现在只先对三个最与全书有关（而也相互有关）的问题，略加讨论，以省后来重提之烦。

第一个问题是：历史是什么？是否如神学家说的上帝之安排，或过去史学家所描写的帝王之创作？他有无法则可言，能否成为一种科学？或者只能成为一种文学？历史书是否可信？是否如中国有人说的“相斫书”，或如汽车大王所云，一堆“谎话”？或者如今日许多神学家、新实证派与生存哲学家说的，历史无意义，也无法则可言？

我想这些问题，可由人类之本质，历史和历史书的性质来加以解答。人类最古的祖先的生活，是与一般高等动物差不多的，他们用他们的五官四肢适应他们的环境。人类其所以高于动物，即在人类除了力求适应环境之外，并能设法抵抗，驾御，且改造而利用之。此由我们祖先制造了工具。富兰克林说，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。马克思派即以此为根据。但如人类不能造意，不能说话和思想，毕竟是造不出工具的。而且人类如无道德维持社会生活，也不能制造和改善其工具。我说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。这才使人类离开自然史进入人类史。人类以文化开始其历史。文化者，即是人类整个性能对环境交涉而生的新能力。文化，即一切德性、知性之创作；技术、制度、学艺

之发明；是人格之标志，是人类之生活方式，亦是用以增进人道，扩张人力，维持和改进生活之工具。其次，等到人类发明文字——这不过是五六千年前之事——以后，他们便将共同生活的重要事实与经验记录下来，为扩张、改进经验之基础，于是严格意义的历史也就随着文字而开始了。历史记载人类重要活动及其变化，自有文学的性质；更重要的，是要将重要经验组织起来，这便有科学的资格。孟子说历史有“一治一乱”之节奏。司马光说历史要记载“国家盛衰，生民休戚”。自孔子，司马迁，班固，直到戴名世，又常以“因、革、损、益”概括历史的重要活动。“因”是继承过去办法，“革”是创新与革命，“损”与“益”指废除旧而无效的和加入新而必要的办法，相当于改革。此文化创造过程中之四大基本动作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历史亦然。在数百数千数万乃至数十万年间，人类继续前人所走的路前进。但我们不走覆辙，有的路加宽，有的路拉直，并发现捷径，开发新路。治乱盛衰之由来与因革损益之成败，构成历史之基本法则，亦即历史的教训与意义。又科学之功能在其预见力。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就与经验，皆是历史。只有奴隶，才完全做历史的傀儡。然除非原人，也不能否认历史的影响。所以，人类也可说是历史的动物。史学教我们由现在所由形成以推论将来。我们的祖先最重视历史。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仓颉就是史学家。以后孔子、墨子、老子，无一不由史学出来。但他们并没有教我们为传统拘束，而是教我们“鉴往知来”，进行适当的因革损益。这和美国史家鲁滨生（Robinson）所谓“利用过去，计划现在”，是一个意思。历史上自多罪恶和谎言，然在历史著作由帝王家谱转到以广大人民生活方式为主体时，则谎言难施其技，而罪恶亦可望渐消的。

第二个问题：假如历史是有变动，且此变动是有若干法则的；可以发生这些问题：是环境决定历史，还是人的意志决定历史？生活决定意识，还是意识决定生活？即使对这问题左右袒后，还有一个问题接着发生：即意识也好，生活也好，他是自动变化的，还是因外力而变化的？例如黑格尔，马克思，在前一问题上分袂，然以历史因内在法则（即辩证法）而变，则是一致的。大多数实证论者，则多半求历史之动力于外部自然环境或文化传播之中。此外，至少还有两个问题：其一，历史运动有无一定目标或方式？其二，如有之，重演呢？升降或进退呢？古代印度人，希腊人，相信历史变化是轮回式的；波斯人，希伯来人则相信是有一定“梯形条款”的。到了近代，大多相信

历史有一定进化阶段,但也有人相信历史只是各民族“固有精神”的发展。到了最近,如斯本格勒(Spengler)与东比(Toynbee)相信历史与文化只是一种生、长、衰、亡之轮回。中国人则轮回、进步两说皆有之。

我想这些问题可以由上述历史与文化之性质来加以解答。人类文化之创造,根本是产生于人与环境之相互作用(Interaction)之过程中的。而所谓环境,不仅自然环境,还有人群环境。每一民族有其外部的国际环境,每一个个人也有其国内的社会环境,其间也有相互作用。道德与知性,技术、制度与学艺,皆是相互作用的。一切因革损益,皆对固有文化形态而言,也是现在与过去之相互作用。所以,在文化中,意识与生活,内在与外在,精神物质之对立,即失其意义。自原始人之石斧或图腾,到今日之机器,或国会,原子弹,或联合国,殊不能划归于物质或精神。人类史即环境与人力消长史。这消长关键即是文化。人类史即文化史,我以为只能以整个文化的变动来解释历史。然文化毕竟是人类知性与德性之创造,所以知识与道德是历史的原动力。关于文化(Culture)与文明(Civilization)之许多区别看法,亦皆由附与精神或物质性质而来。本书用于同一意义,这也是应在此处申明的。

历史有无一定的大趋势?我以为有。此因历史是人类共同活动之结果,而人类有共同之性能与愿望。对此趋势,我愿意用进步(Progress)而不愿用进化(Evolution)来表现之。因为人类之进步,到底与生物进化是不同的。人群之扩大,创造力生产力之提高,人格尊严,自由,幸福之增进,一言以蔽之,文化之进步,是人心所同欲,亦即历史大势之所趋。一切罪恶必借暴力进行。然人类固有的道德心,知识之不断进步,终必造成暴力之失败。

历史有无一定的阶段、模式?不一定。历史是一社会内外因缘之和会,内部的既成社会文化状态,与外部的自然的国际的环境交互作用之过程。在此过程中,必定发生新的问题或危机,于是这社会亦必有因革损益的活动来解决。但在这中间常有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,可为加减乘除。因革损益遂亦有成败。大体而论,文化之蓄积,内部之和谐,可以创造伟大的进步和国力。但自满、孤立,可以加强惰性和停滞。在社会每一大变动后,也自有得利最大的集团。然一旦内外形势再变更后,需要“变法”之时,既得利益阶级应付无方,即不能作适当的因革损益,尤其是自私与愚昧,常可以造成落后,腐败,国内国外的战争,国力之浪费和破坏,乃至文化之瓦解与灭亡。至此,一国文化又将依赖若干新因素与良好旧的传统结合而为再生了。我

常想历史可说是一种“合成力之科学”(Science of Resultant)。前期的,自然的,文化的,国际的因素以及各种集团的力量,都在作用。历史,在一定时期,作为各种力量消长之最后结果,有一定结局;但人力,乃至每一个人之力,也能有其地位,即在于此。因此历史是一种不严格的科学,他为“事在人为”留下甚大余地。种种有利的因素造成进步,不利的因素亦造成退步;相同的因素则造成重演、循环与平行。此外,文化各部门之进步,不是均衡的;例如技术和制度之矛盾,是历史上常有之事;此种不均衡可以促成文化进步,也可造成文化病象。再则,各种文化之进步,有的是有一定限度或“报酬渐减”的。例如,希腊的雕刻,商周的铜器,以后几乎即无进步,此时人类努力,即应掉换方向了。

第三个问题:个人与社会何者更重要?英雄与时势何者是主体?这原是一个“鸡”和“蛋”的问题。也可说是一个“连锁反应”过程。一个社会总有一定的统治阶级希望保持现状,而亦常有大小问题发生。如无前知早识之士发起因革损益,文化不会进步。但先驱者也依然是其文化环境之子;且如过度突出孤立而无后援,难免窒息。不过大体而论,新技术,新观念,新思想的倡导者,常是一社会中与知识最接近的人,此即所谓知识分子。所以我愿意承认知识分子是历史进步的动力,虽然亦必受社会之节制。凡希腊所谓智者(Sophist),爱智者(Philosopher),罗马所谓文士(Literati),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所谓哲学家,“观念家”(Ideologue),“经济学家”,以及近代所谓科学家,著作家;中国自古以来所谓师、儒、士、圣、贤、哲、文人、学士,以及一般称为“读书人”者;今日各种以知识、学问、文章、技术,从事精神劳动者,皆所谓知识分子。试想,西洋史除去柏拉图、亚理士多德、圣奥古斯丁、圣多马、哥白尼、达文西、莎士比亚、培根、笛卡儿、洛克、百科全书派、牛顿、康德、歌德、亚丹斯密、瓦特、巴士德、赫姆荷兹、边沁、达尔文、居理、普朗克、爱因斯坦等人之外,欧洲还有什么呢?以中国而言,四五千年来,帝王将相,真不可胜数。但在一般人心目中,大概多半记得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,因为他们是有学问的皇帝;记得周公、管仲、萧何、韩信、李广、卫青、班超、诸葛亮、魏徵、李靖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岳飞、刘基、张居正,也因为他们是具有学问的宰相或将军。除此之外,不大读书的皇帝或将相,除了四五个尊重读书人的开国之君外,恐怕只有二三亡国之君以及奸臣汉奸之类,如陈后主、石敬瑭、秦桧之类,为人记得,或貽臭万年而已。就是荒唐皇帝如唐玄宗,也还要文人

渲染才为人记得；宰相之中，也还要读半本书如赵普者，才为人记得。而就是国家已被亡国之君断送后，撑持场面的，不也还是靠几个读书人，如文天祥、史可法吗？但谁不知道孔、孟，知道鲁班、墨子、老子，知道董仲舒、张骞、太史公、张衡、郑玄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陆放翁、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、施耐庵、罗贯中，以及明末几位大师呢？

作为读书人这一集团，在文化充分发展普及以后，自然是会逐渐消灭的。不，会逐渐消失于一般人民之中的。因为那时候，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了。但在这以前，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上，自然表现最重要的作用，这是一部人类史所证明的。文化即人道，知识即权力。人类赖知识文化之功，超乎禽兽之上，提高其能力与自由水准。而知识分子则直接担任文化创造者，知识传递者，人民教育者，道义维持者，因而社会进步之推动者的责任；以及在世衰道微时代，担任人性保持者，良心鼓舞者，因而社会安定者的责任；乃至在乱亡时代，担任文化火种维持者，人道一线代表者的责任，交与后来复兴的人。知识分子可说是历史之工程师和文化耕耘者。

语云：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”其实古往今来，一切的反，都是秀才造出来的。不过，“打天下”后，要想“坐天下”坐好，则少数秀才，或普通秀才，往往不成。这非有多数大秀才不可。也许“三年”的确不成。因为没有二三十年的准备，任何思想运动不会有真结果的。

基于以上三点，也便有本书的研究方法。过去所谓史学方法，主要是史料批评，或考证方法。然这只能确定个别事实。史学尚须利用种种补助科学社会科学，理解个别事实之意义，将其连络起来，并织入历史之内外构造之中，考察其相互作用，来说明一代社会文化之形成；并考察这社会中的人物之因革损益活动之得失，来说明一社会之治乱兴衰。再者所谓批评、考证，无非是史料之比较。为求历史之真实，必须扩张比较的范围。而将世界各民族之文化成就加以比较之后，历史学虽是一种不严格的科学，却又是一种文化批评，或文化哲学，而比科学为多了。

## 二 中国历史与知识分子之特点

在世界上最古的文明民族，在伊朗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埃

及、克列特诸地进入有史时代初期稍后，我们的祖先，也在东亚发展了中国的文化。拿中国文化与历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，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这即是唯有中国历史文化一直维持五千年之久，而未中断。此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有机性。我想引用英国考古学家布洛德里克(A. H. Brodrick)的话：

“中国文化自新石器至今日中共之时，至少有四千五百年。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乃世界一种标准文明，对我们而言，实较埃及，苏末或近东文明(不管我们间受惠于他们者如何之多)，更富于启发性。当华北全面都市文明发展时，印度河流域文明已开始凋谢，且迅即消灭；在埃及，在巴比伦，其文明开花之时，乃如是之荒远，如欲证实其存在，尚须大费气力。除克列特外，当时欧洲实根本无文明可言。然而，中国文明依然存在——我们亦不知其究要维持多久——当殷商后裔统治华北之时，我辈祖先，还是蒙昧人(Savages)，至多不过野蛮人(Barbarians)，此固世所公认者也。”(“The Tree of Human History”)

他又说：

“再者，古代中国乃一连续的顺序，在自然史，在中国史方面皆然。中国古史所谈远古之事，自多臆传。

但另一方面，考古学证据，却以惊人的态度，证实了这些传说的许多。”(同上)

按：从太史公《史记》之十二诸侯年表，载共和元年(公元前八四一)开始之事，加上鲁之《春秋》，连上历代正史，下至民国纪元凡二七五二年，几无间断。自共和元年前溯黄帝，史公仅有三代世表，不详年代。根据刘歆推算(《汉书》律历志引《世经》)，夏禹元年应为公元前二一八三年(如据《竹书纪年》应为公元前二〇八九年)。邵雍《皇极经世》推唐尧元年应为公元前二三五七年。今日东西人士据天文及殷历推算，大致不差(参看第六章及董作宾《中国古代文化之认识》)。上溯黄帝年代，汉人有二说，一谓自黄帝至汉昭帝三千余年，一说六千余年(《汉书》律历志引)。不过据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推黄帝年代，为公元前二六九七年。辛亥革命时，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，即本于此。虽未可尽信，要不失为论史之标记也。这样完整的历史，确是世界之惊奇。

其次，我要举出中国历史与文化另一最大成就，这即是中国最初建国，原不过今日陕甘青、川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北、河南之间的小范围，然逐渐扩

张,不仅包括今日地图上之版图,且对东北亚、东南亚、西北亚放射,启发各该地民族之建国;如日本、韩国、越南,其最著者。在此一广大区域,民族之复杂,原不下于欧洲与西亚,然终融合为一个单一的东亚中国文化的大国家。而此一国家之形成,又非由于征服(反之,中国有时反被征服);盖征服仅能造成政治之统制,不能造成文化之统一。而且,在历史上,中国虽非一不武之民族,究非一黠武之民族;中国圣哲之教训,乃素对用兵一事,悬为重戒者。这亦是全世界所公认的。

这特色和成就,也许就是法国人所谓“中国之奇迹”(Le miracle Chinois)。此即中国文化之奇迹。此一奇迹,无非证明中国文化实在富于创造力,吸收力与包容力。而此一奇迹之由来,无非由于中国文化本乎人情,合乎理性;同时,万不可忽视的,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种极聪明的文字,成为东亚的一种世界文。因此,就有我们绵绵流长之泽,泱泱大国之风。中国文化的这一种陶融力,只有今日美国可以相比。谓中国为古美国,美国为一新式中国,决非过言。

这一种文化形成的原因,下章(第二章、第三章)将另说明。此处我要指出的,这奇迹的创造者非他,即中国知识分子。

中国知识分子若和世界知识分子相比,也有两个特点。其一,是人文主义发达之早。中国知识分子与各国知识分子一样,原都是宗教之给事人。但中国知识分子却最早由宗教解放,研究现世的知识。德国大学者韦伯(Max Weber)对中国历史无完整知识,谈到中国,不免东扯西拉,但他的炯眼却早已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之特点:

“中国知识分子之领导层,从来没有基回二教教士,或犹太教之拉比(Rabbis),或印度教之婆罗门,或埃及祭师,或埃及印度之文士或法吏(Scribes)的性质;此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式,有无比重要性。中国的儒者(Literati),虽由礼义训练而来,实由对俗界士君子之教育而来的。”(“From Max Weber”)

其次,若将中国知识分子与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比较,可以发现另一个极大不同,即希腊罗马知识分子多半是奴隶主,而中国最早的专门的知识分子,是史官。其后如孔子,是“少也贱,多能鄙事”的平民;墨子更出身于职工匠人阶级。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富于平民精神,民主精神。这些,都有客观原因,也将在后面解释。

自此以后,中西知识分子之地位,情形大体相似,只有程度不同。在中国战国时代,知识分子多为贵族宾客;文艺复兴期直至十八世纪前半,西洋知识分子,也多赖贵族的“Patron”为生。两汉以后,中国知识分子争取了参政权,多为公教人员;而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,亦复如此。如英法学者多为私人教师,东印度公司职员;德国学者,多在大学。所不同者,即西方工商发达,自由职业者更多。其次,西洋因有国会制度,随宪政及政党政治之进步,知识分子取得进一步主持国政的地位。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虽早,而效果反而大为不如,这也是值得提出的。

### 三 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

数千年间,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文科学,自然科学,文学与艺术上,贡献其心血;教化国民,发明制作,提高生产水准;并团结国民,保障国家安全。此外,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较早由宗教解放,直接间接,以参政或论政,以极大责任心,为平民利益而奋斗;同时,以极大自尊心,为知识分子地位而奋斗。为提高知识分子之地位而奋斗,不是为知识分子自身说法,而是要以智力压倒武力或金力贵族,提高平民之地位;并且以学问为提高平民幸福之工具。在人类社会尚未进入完全民主时代,一般是为少数武力集团所统治,此武力集团形成一种贵族,乃中外所同然。然数千年来,中国人从不认此为当然,从来将人民的地位看得很高,使寡头不无忌惮,使帝王权力有所限制,因而使生民仍得一定之保障;这首先应归功于中国知识分子之庄严努力。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是平民的代表。不仅他们以此自任,且几乎成为不成文法。为知识分子地位而奋斗,即为平民地位而奋斗。

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维护平民利益,而且是在道义上,在行为上,将其责任心、自尊心人格化的。这实在比思想更为重要。

如问什么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精神,不如看中国知识分子之风度。如问什么最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之风度,我以为便是“儒”和“侠”。最早的精神代表者便是孔子和墨子。(这句话只指墨子富于侠义精神而言,不一定如梁任公所云秦汉以来之侠,即先秦墨家之传。)此外,儒和侠在消极状态中,也往往采取一个共同方式,即是“隐”。而其代表者,即是道家。这原是

先秦鼎立的三大“显学”。三者本非有截然界线,也可说皆有很早渊源。

儒为有道术(学问道德)者之通称(后将详论)。皋陶所谓“身修思永”者是(《书》皋陶谟)。他所谓九德:宽而栗,柔而立,愿而恭,乱(治)而敬,扰(和)而毅,直而温,简而廉,刚而塞,强而义;为论儒者品格之最早者。其后所谓“敦厚温柔”,“疏通知远”,“恭俭庄敬”,“广博易良”的诗书礼乐之教(《礼记》经解),是儒者基本的精神。这也是殷周至春秋时代许多贤士大夫的风度。

最早一个有侠气的人物,是宣王时仲山甫。尹吉甫在《烝民》之诗中称赞他说:

“维仲山甫,柔亦不茹,刚亦不吐。不侮矜寡,不畏强御。”

隐则更早。除巢父、许由逃国,伯夷、叔齐丑周之外,三百篇中颇有隐者;如:“衡门之下,可以栖迟。泌之洋洋,可以乐饥。”

而孔子固儒家之祖,也可说一个有三种人格的人。他有“君子修己以安人,以安百姓”的责任心,有“不忧不惑不惧”的自尊心。因此,他除了温良庄恭俭让的儒者风度外,还有一种“刚毅木讷”的威严,“强哉矫”的勇敢。他说,“若臧武仲之知,公绰之不欲,卞庄子之勇,冉求之艺,文之以礼乐,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又说,“见利思义,见危授命,久要不忘平生之言,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他的大弟子曾子说,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,仁以为己任。”唯其有这种责任心,他又说,“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欤?君子人也!”矜矜然侠气逼人了。而另一大弟子子路,曾以标准武士而殉身。又,孔子说过“无道则隐”。他到处奔走,遇到许多隐士,不无同情,尝叹息“贤者避世,其次避地”;又说“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”他甚至有时也有“乘桴浮海”、“欲居九夷”的想法。只是生命力坚强,才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。但他说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,到底是不否认隐在一定时期之必要的。

《礼记》儒行篇记孔子论儒者风度。他说:

“儒者强学待问,力行待取。”

言必先信,行必中正。爱其死以有待也,养其身以有为也。

不宝金玉,不祈土地,多文为富……非时不见,非义不合。其近人有如此者。

礼以和为贵,忠信之美,优游之法,慕贤容众,其宽裕有如此者。

推贤而进达之，不望其报。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。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。

合志同方，营道同术。久不相见，闻流言不信。其交友有如此者。”这是儒家儒雅本色。我们再看：

“儒有委以货财，见利不亏其义，沮之以兵，见死不更其守。其特立有如此者。

可亲而不可劫也，可近而不可迫也，可杀而不可辱也。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。其刚毅有如此者。

忠信为甲冑，礼义为干櫓，戴仁抱义，虽有暴政，不更其所。其自立有如此者。

身可危也，而志不可夺也。虽危，起居竟信其志，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。其忧思有如此者。

患难相死也，久相待也，远相致也。

澡身而浴德，陈言而伏……世治不轻，世乱不沮。同弗与，异弗非也。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。”

这是一个何等刚强，何等虎虎有侠气的老人家！又说：

“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，慎静而尚宽，强毅以与人……博学……近文章砥厉廉隅。虽分国如锱铢，不臣不仕，其规为有如此者。”

这已是隐者的态度了。后来宋元之儒，以此篇为“战国豪士”之说，“不合圣人”；适足见其为迂儒耳。

太史公作《游侠传》，以孔子“弟子季次，原宪之伦，怀独行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”，为游侠之祖。东汉学者与党锢人物，王阳明一派的儒家，以及东林复社诸人，都有一股侠气。所以我们崇敬的人格，是所谓“儒侠身兼”。实在的，儒无侠则虚，侠无儒则盲。然真正的儒侠隐固皆专制者所不喜的。韩非云，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。”而“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自食其力”的狂裔华士，他也认为该杀（《外储说》）。后来皇帝，也大抵看过他的条陈。久经摧抑之余，儒者不免有“阉然媚世”之流；侠亦不免“朋党暴豪”（史公语）之卑；而“隐”遂亦有“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阙”之鄙者矣。

由此言之，儒、墨、道，与其说是三个学派，不如说儒、侠、隐是中国学者之“三态”。而“儒”也可说是其通称（袁枚诗：“三分孔墨二分庄”，即是此意）；虽然这三者还是可以分开来谈的。〔注一〕数千年来，中国知识分子以

平民代表的资格,本忠恕立场,仁义原则,为生民请命;必要时,挺身而出;万一无法,退保方寸之安。但无论如何,不受货财暴利之淫屈,可杀而不可辱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。这种精神教育,铸造了中国之国格,也就保证了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发展。没有这气概,早已没有中国了。

## 四 知识分子与国运

由上可以看出,一个国家的生命,在其文化学术,而一个国家的生命力,在其知识分子;在其知识分子之责任心与自尊心,唯其有责任心与自尊心,也才有创造力。所以,一个国家要生存和进步,首先是这国家能尊重学问,而这社会知识分子能有自尊心。昔希腊哲人以爱智自豪。柏拉图云:

“我国人深爱知识,此我国民之特色。如腓尼基人与埃及人,则以爱货财为特色。”

孔子说:“好学近乎智。”这“好”字实有至理存焉。好学问,尊重读书人,正是我中国民族之优良传统。由于中国最初的建国者都有学问,所以我们素来相信“建国教学为先”(《商书》);说命曰:“念终始,典于学”(《礼记》);相信“唯善为宝”;相信“唯立德立功立言”,始为不朽。三代政治,皆以学校为基础。加以孔子之提倡和感化,国人益知尊师重道。孔子说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;这是何等好学精神。孟子曰:“孔子贤于尧舜”;这又是如何尊重学者!由于我们能尊重学问,而学者亦能自尊,所以才有我民族之文德,造成这大这久的国家。在这传统之下,即使是强盗,都不敢侵犯读书人。如黄巾不犯郑玄之乡;黄巢杀人如麻,然决不敢杀读书人。李自成事事学黄巢,在这一点,也还保持黄巢的戒律(见赵翼,《廿二史劄记》)。此外,如果是大流氓,如曹操也者,对于杀读书人也还是不无畏忌的!

尊重学者与学者自尊,非知识分子优越感之意。在中国,“士农工商”,士居四民之首。但是“渔樵耕读”,读也是四业之基。尊重读书人不是保持读书人这一阶级的特殊地位,而是尊重真理与公道,亦即人道;而是尊重学问与知识;盖学问与知识也者,是最民主的,是人人可学而得的。在金钱与权势两大力量之前,提高学问之地位,不仅可以保持平民最后之尊严,亦是用以改革社会之武器。知识分子之可贵,在其代表平民;至于东汉之末的

“累世经学”，以及六朝贵游子弟，已经变为阀阅，脱离知识分子立场了。后来，有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之说。此乃北宋以来帝王牢笼之谬论，恰恰不是尊重读书人；读书人的地位，反而自此而玩偶化，而卑下了。

但是，这并不是说中国历代都能保持这一优良传统。昏暴统治者，鄙视学问，挫辱知识分子之事，层出不穷。毫无疑义，不尊重学问，不尊重知识分子，乃至摧残虐害知识分子（包括杀害与牢笼），是一个社会堕落与自杀之最显著征候。不过，没有一个压迫知识分子的国家能够兴盛的。而摧残知识分子的统治阶级，也断乎是不能久存的。读书人是不好得罪的。

仅仅统治者儿戏学问，迫害知识分子，还不足以亡国。如果知识分子自己不尊重学问，自己不将自己当人，那就不仅亡国，而且要“亡天下”（顾亭林语）了。当知识分子违背了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传统，忘记了责任心与自尊心而自贱自辱之时，那就是国家之神经崩溃与心脏衰弱。此时即将有虚伪充道德，八股代学问，而阿谀说谎即文章；此时荒唐将视为英雄，符咒将视为天书。此即价值标准开始颠倒的时代；亦即将为公然的恐怖，公然的无耻，公然的价值毁灭开路的前夕。什么时候违背好学自尊的传统，什么时候是国家之乱亡。这一历史法则，可以说是绝对的。不过，读书人到底压不下去，终有新型读书人起来，重开国运。这也同样确切。

中国第一个有系统的摧残知识分子的，是秦始皇。此即焚坑之祸。但知识分子从事反秦运动，旋秦亡而汉兴。两汉知识分子正式参加政权，其间固亦多挫辱，但读书人自爱之心极强；两汉国力源泉在此。不过到了后来，经外戚宦官之腐化，士气渐衰；而宦官复作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第二次的大摧残。此即党锢之祸。然而，汉亦因此而亡。至于魏晋，知识分子多不保首领，而五胡之乱亦起。经六朝之毁灭与再生，有一批新知识分子出来，乃有隋唐之运。隋唐之世，其初颇重文治；故唐亦能恢张汉业。而知识分子之自尊心，甚至有过汉时。中叶以后，又渐蹈东汉之覆辙，而士气亦趋于卑微。于是小流氓朱温移国，且“投清流于浊流”。然知识分子固颇多自爱者流，故旋有宋之统一。两宋表面上颇能尊重读书人，但得国侥幸，一直为“患得患失”之心所支配，对知识分子并无诚意，且从而挑拨软化之。不过究竟因为“不杀读书人”，所以虽瓦解而未至土崩而已。到了南宋末年，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先有迫害政策，后又用收买政策，士气遂由虚弱而卑污。而宋朝也就完了。元初摧残知识分子，后来改变政策。朱明原得知识分子之赞助而起，

但朱元璋及其子孙对知识分子为有组织的侮辱。后来王阳明的学说，根本目标即是重振知识分子自尊心的。明朝末年，许多学者的气节，即得力于此。不过经魏忠贤与崇祯之摧残，已所余无几了。清朝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，对知识分子承元明之经验，采取诱胁兼施政策，士气日益堕落。所以近代国耻，也不是偶然的。清末因新思潮之输入，士气得一恢弘机会。但抑压过久，一旦解放，不免乖张，一时乃无可避免之事。但如民初以来，政治上稍有轨道，必可趋于正常。不幸袁氏当国，他最大罪恶不在其他，而在继续爱新觉罗之秘策，大举破坏读书人廉耻一事。而这对于民国以来学术文化之破坏力，是极猛烈的。或者有人以为道德与知识不是一事，廉耻与文化不是一事。其实道义为文化之本，而罪恶大抵起于无知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即在除自己外，想到别人；除今日外，想到明天。于是自奋其智力，而亦在人群交感中与未来注视中发展德性才智，此即文化之创造。廉耻荡然者，是责任心与自尊心丧失之结果。至此便只能以智能为身家谋，为本能计；则所谓文化之创造，只是天外奇谈了。礼义廉耻不仅四维而已，那是国家的命根！由此可见国运之沦落，是与知识分子地位之卑下，尤其是他们之自卑平行的。而士气之兴衰，其由来皆履霜也渐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士气、民心、国风，陵夷至于民国之初，实非大政治家大学者赤诚斡旋二三十年，难于挽回颓败。

## 五 会通中西文化发扬自尊精神

我相信历史之学可给我们以智慧与力量。一般而论，我们应该阐扬世界文化历史和潮流；特殊而论，应该阐扬中国文化之精神与价值，以及我们许多伟大先辈立身处世之精神，首先是他们的责任心与自尊心。不仅如此，新的精神与力量亦将由此而出。

整个中国文化传统，即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传统。在这一点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一切人类最优秀的创造，是方向完全相同，内容完全相通的。在近代中西相遇以前，中国也许没有近代欧美之系统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科学成就。但是，这在中国文化中，实在萌芽得比任何国家为早。也许中国没有西欧文艺复兴后的一个充分个性觉醒的运动，但中国实早有一个类似的自由独立的精神。我们讲“仁”讲“恕”，讲“四勿”，讲“和而不同”，讲

“良知”“良能”，讲“格物致知”，讲“天理”，讲“自然”，便是宽容与理性精神——而这实即今日科学与民主之根本。须知德先生赛先生并非西方特有成就，无非是宽容与理性精神在一定阶段中之开花结果而已。

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(只要是一个像样的知识分子)，纵使主张各有不同，但一贯的传统，一贯的趋势，是以强大责任心自尊心自信心为生民为天下尽其心力，为平民，为知识及知识分子之尊严而奋斗的。我们的祖先最无阶级种族之成见。他们提倡博爱济众，视天下犹一人；推不忍人之心，张上天好生之德；抗残民之独夫，求生民之同乐；认“民为邦本”，认“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”，认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。他们确信每一人之人格尊严，说“尧舜与人同”，“我虽不识字，亦须堂堂做人”。他们反对独断与迷信，相信“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相信“孔子门前亦须讨个是非”。我们祖先尤其尊重道义，藐视强权与暴力；不义之富贵看得一钱不值，然而义之所在，生死以之。我们决不欺凌弱小，但一定抵抗强暴，决不做外国的奴才。这正是中国文化之血脉与心传。而每一个受中国文化熏陶者，应该以承继先贤志业自任。这都是我将在本书中说明和证明的。

我表彰中国文化与学者之精神，并无“唯我独尊”之意。文化出于人性，性相近而习相远；而相生相克，终归大同。故世界文化，各自含英，亦有共性。此由确认人性尊严，解放人性能力始，以提高全人类之自由与幸福终。故各国文化纵闻道有先后，造诣有参差，但最后必汇合为人类文化，共赴此一历史之主流。在此意义上，文化并无东西之隔；即陆象山所谓“东海有圣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；西海有圣人焉，此心同，此理同”。尤无精神物质之别；亦即王阳明所谓“道器不可离，二之即非性”也。我只是说明，在历史之最长期间，中国人在人类文化上有卓越的贡献。我们曾在古代与人并驾齐驱，我们且曾在中世凌驾万国，这使我们为子孙者，大可自豪。但我也必须指出，十九世纪以来，中国文化既因衰败而落后，复因落后而衰败。此非长他人之志气，正所以明耻以励复兴。我相信：今日他人有胜于我者，亦犹过去我有胜于人者。他人有善而不能从善，不可也。然昨日我曾胜人，今日他人既能胜我，即证明我明日亦可胜人；无有为若是之心，亦不可也。然文化创造，终在自己之心得，若仅能人之长，即为已足，不知此时他人又已进益矣。如此势将永在他人之后，亦不可也。故师人之长，贵在师其意，师其法，使自己固有之文化更能提高，亦即使自己固有之智能，自有进步。所以，发

扬旧学与摄取新知，根本即是一事。若视为二事，皆昧于文化创造之义。创造云者，生生不已，推陈出新，踵事增华，日进无疆；所以对人类文化总量有增益，对人生幸福能增进者也。若以新旧为二事，以展览前人之说，为整理国故；袭取他人牙慧，为介绍新潮；于已有之文化总量，固无所增益也。若以中西为二事，以他人长于器械，我则长于道德，曾不细思，国家忧患之来，正不在器械之不精，而适在道德之不足；此则纵非文过饰非之言，亦为护短藏拙之意矣。世界各国均有才智，一时成就有高低，事甚寻常。正宜观摩，集思广益，以促文化之进步，岂能故步自封？然各国历史自有其继续性，必自出心裁，始能合用，不仅无法舍己从人，亦不当永远借他人之财产，认为自己之所有也。我国之所以能如此悠久博大，我国文化之所以有其创造力，即在其有博采兼收，师人之长之气量。古语云：“河海不择细流。”孔子说：“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我们祖先对于胡人，对于印度，即有片善，皆学之如不及；而中国之为中国自若也。不仅此也。必须取精用宏，始能会通求胜；由能人所能，以求能人所不能，始为创造之能事；而此亦吾人之祖先不断表见于事实者。孔子讲“有教无类”，讲“和而不同”。前者之意义，是说真理无阶级，无国界。后者之意义，是说思想只能求复杂之调和，而不可求统一与同一。张我见之幔，树人我之障，皆优越感自卑感之恶习，亦皆衰世之兆征，或衰世之后果。我们对于世界文化，使有可取者，即不是中国的，亦当学习之，况中国所固有者乎？使无可取者，即是中国的，亦当摒除之，况非中国者乎？发展自己之长，并兼有他人之长，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，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。

[注一]此书以论“儒”为主，偶及“侠”“隐”，后二者，实宜有专书论之也。《史》、《汉》于“侠”均有列传。以后正史则无传，不过马援诫子弟书中所说杜继良豪侠好义，《后汉书》“独行”、“逸民”传中人物，下至党锢中人，皆其流风。《晋书》及“南北史”时有记载，尤多见于《逸行传》中。晋王衍有悍妻，唯惧大侠李汤。郭璞诗：“京华游侠窟，山林隐遁栖。”此后侠隐多合流于山林。隋唐游侠复起，唐人小说多纪游侠（如《虬髯客传》，《红线传》）。后来剑侠小说，渊源于此。韩愈《送董邵南序》，犹见其人。至于宋代，观欧阳修所说的石曼卿与释秘演，苏轼所说“光黄之间多异人”的方山子，可知流风未衰。元

代游侠甚盛，且有组织，朱元璋颇借此而兴。至于明清，中国平民文学，除才子佳人外，以侠义为主要题材，虽多非实录，而人心所向可知。自五人墓碑及东林复社以来，明末诸儒多从事游侠组织，为后来秘密结社之起源，不仅魏禧《大铁椎传》虎虎如生，吴伟业《咏史》诗“谁修侠客传，阙疑存二子”之流连咏叹也。惜乎清末以来，虽有其形，而神渐失。关于隐，史不绝书。专记则皇甫谧《高士传》后，以郑樵《通志》隐逸传所载为多。元明以来之隐，藏身道冠僧寺中，固多隐而侠，或“英雄回首即神仙”者也。